

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生成、对话与回响

王松, 钱俊伟

(北京大学 体育教研部, 北京 100871)

摘要: 运用文献分析、归纳演绎与比较分析等方法, 对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生成脉络、理论建构及在中国语境中的回响展开阐释。研究认为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生成, 根植于其生命体验中相互交织的三位一体逻辑。在与经典理论的对话中, 埃利亚斯通过批判康德先验认识论、帕森斯静态结构功能主义, 创造性吸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韦伯的理性化, 逐步建构起以“型构”“社会过程”“心理发生”与“体育化”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语境下, 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回响, 为中国体育社会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其一, 确立“投入-超脱”的研究姿态, 以追求“有温度”的客观; 其二, 坚持“过程-关系”的分析范式, 以超越静态结构表象; 其三, 拓展“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以激活深层次想象力。

关键词: 体育社会学思想; 生命体验; 自主知识体系; 诺伯特·埃利亚斯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6)03-0059-07

Formation, dialogue, and resonance of Elias's thought on sports sociology

WANG Song, QIAN Junwe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inductive-deductive reasoning,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elucidates the intellectual genesi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Chinese-contextual reception of Elias's thought on sports sociology.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Elias' thought on sports sociology is rooted in a triadic logic embedded in his life experience. Through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classical theories, Elias challenged Kantian's transcendental epistemology and Parsons's static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while creatively incorporating Freudian's psychoanalytic insights and Weber's thesis of rationalization, thus on this basis, he gradually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figuration, social processes, psychogenesis, and sportization. With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constructing an indigenous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the resonance of Elias' thought on sports sociology offers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sports sociology, which includes establishing an involvement-detachment research posture in pursuit of a form of objectivity imbued with human sensitivity; adhering to a process-relational analytical paradigm in order to transcend static structural appearances; and expanding a historical-sociological research horizon so as to activate deeper imagination.

Keywords: thought of sport sociology; life experienc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Norbert Elias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作为理论思维载体, 哲学社会科学通过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推动着社会历史进步。2025年10月23日,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 进一步强调“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2]。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 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理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 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

收稿日期: 2025-11-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4CTY002)。

作者简介: 王松(1994-), 男, 助理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体育、文化与社会。E-mail: wangsong@pku.edu.cn 通信作者: 钱俊伟

会科学这三方面的融通^[3]。作为体育现代化后来者,中国的体育理论体系是在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体育理论中逐步形成的^[4]。立足中国,批判融通西方体育社会学资源,是构建中国特色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路径之一。

在众多西方理论资源中,埃利亚斯是为数不多的一位将体育当作社会学理论生产力而作“专业性”研究的体育社会学先驱^[5],其体育社会学思想已对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也激发了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体育现代化、竞技情感、污名化等议题上展开积极探索。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其成熟理论的应用与阐释,忽视了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本身的生成逻辑、内在建构过程及其之于中国语境的镜鉴。这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的本土化。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溯源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析理其核心内容,并审视这一思想传统在新时代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本土关照,有助于为中国体育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理论资源与实践镜鉴。

1 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源起:生命史中的理论准备与问题意识的生成

1.1 体育实践:作为认知社会与理论建构“具身性”基础

“具身体验”是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经验基石。埃利亚斯并非远离体育实践的旁观者,而是一位终身体育的践行者:青年时代的专业拳击训练^[6],使其对肉体暴力、规则控制与疼痛忍耐有了切肤之知;毕生坚持的游泳与滑雪^[7],让他深刻体验到身体在自然力量中的自律与协调。这些个人体验构成埃利亚斯理解社会结构与心理机制的原始经验积累。他早年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其实践与组织活动中倡导通过田径、拳击、游泳和滑雪^[8]等淬炼青年体魄、重塑民族气质,并进一步强化群体认同与组织凝聚力。在此基础上,埃利亚斯将体育加以“方法化”,通过考察体育场域中规则的历史变迁、情感模式的演化和行为规范的內化过程,揭示更为宏观的社会文明进程。同时,丰富的“具身体验”也使他能够洞察学生邓宁研究足球的学术价值,并在其理论建构中逐步生成对身体规训、情感控制与过程性变迁等理论取向的关注。

1.2 战争与流亡:对文明与暴力的切身追问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端经历让埃利亚斯对启蒙叙事中线性进步的“文明”产生了严重质疑,迫使他去追问贯穿其所有研究、具有深刻张力的核心“问题意识”,即所谓“文明”的薄纱之下,为何始终潜藏着非理性与野蛮的巨大暗流?现代人彬彬有礼的行为外表

与残酷的集体屠杀能力如何能够历史性地并存?从《文明的进程》到《追寻兴奋》,埃利亚斯的型构社会学与体育研究一以贯之,构成了他对这一生命之间的持续性回应。他通过分析体育场域中暴力的制度控制与情感的有序释放,使体育成为理解“文明”与“暴力”张力关系的一个微观而可解析的绝佳窗口。这使他关注延伸至体育社会学,其中对“工作-休闲”二分法的批判,推动他在体育领域发展出“文明的进程”研究,从而掀起一场体育社会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9]。

1.3 学术训练:跨学科视野与分析工具的储备

与大多数社会学家从其他社会学家或者哲学家的书中获取知识的路径不同,埃利亚斯的知识立足经验事实(切身经历的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其曲折的跨学科学术训练为他回答核心问题意识——“文明与暴力”张力的生成,储备关键的分析工具与方法论自觉。早年学医的经验,使他系统地掌握了解剖学、生理学知识,奠定他对身体生物性基础的深刻理解,激发了他对具身理论的兴趣和对身体社会学的需求^[10]。这为其日后创立聚焦于“身体”社会规训的“文明的进程”理论提供了具身性认知的起点。随后,他从医学转向哲学,又因不满纯粹哲学思辨而与新康德主义导师理查德·赫尼希瓦尔德产生冲突,从而毅然转向经验取向的社会学与历史学。从布雷斯劳到海德堡,再到法兰克福,他穿梭于哲学、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其跨学科的学术跋涉锤炼了他整合宏观历史结构与微观心理发生的独特能力。由此形成的超越个体与社会、结构与过程等二元对立的思维倾向,构成了埃利亚斯型构社会学方法论的重要雏形。在此过程中,他对传统“工作-休闲”二分法的批判性思考也日益成熟,并将体育定位为研究现代社会情感调控与“文明的进程”的核心领域,奠定其体育型构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2 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建构:在与经典理论的对话中成型

埃利亚斯力图构建一座型构社会学大厦,发展出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分析范式,用以揭示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心理结构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并且,他还把这一理论拓展至体育领域,发展出体育型构社会学的标识性概念——体育化。

2.1 对传统认识论的否定:从康德的“先验”认知到埃利亚斯的“型构”认识

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建构首先是对康德先验认识论传统的消极否定。康德赋予时间、空间、因果性等认知范畴以超越个体外在经验的先验性。当个

体理解体育社会现象时,往往都受到先验观念的预先设定,即产生个体的先验认知。而由于个体都以同样的方式被预先设定,个体的先验认识就会衍生为群体的先验认同。以“村BA”为例,这一体育社会现象常被迅速赋予某些先验的解释框架。个体观众可能预先将其认知为“淳朴的乡村娱乐”“六月六”吃新节篮球赛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当这些分散的个体认知通过亲身体验、在地参与、媒体传播以及社交互动,就很容易凝结成一种群体的先验认同,比如将“村BA”理解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体现”“全民健身的草根典范”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育表达”。这种康德式认知路径倾向于将认知范畴视为既定不变的框架,容易忽视认知本身如何在社会互动与历史变迁中被具体地建构、协商与改变,从而遮蔽“村BA”现象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地方性知识。

埃利亚斯指出康德式先验范畴无法通过“对象/客体的充分性”检验。他认为,认知范畴并非永恒不变的先天形式,而是人类在漫长社会进程中通过符号互动逐渐建构起集体知识成果。进化使人类有能力通过符号相互结识、彼此沟通^[11]。这些符号(范畴、观念、认识等)并不是如康德所理解的是普遍给定的,是经验的一个先决条件,而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生的知识增长。知识绝不能指望个人经验,而是在群体中通过几代人的积累而获得的集体性成果^{[12]36},即整个群体世世代代的群体经验。

为系统把握这种动态的认知生成过程,埃利亚斯提出“型构分析”理论框架。它强调从既成的社会现实出发,基于回顾性视角追溯其从先前型构中衍生出来的可能性路径,而非基于前瞻性视角探寻必然性与因果规律。将这一认识应用于“村BA”分析中,我们便可以超越先验、静态认知范畴,重点考察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关系网络中(如国家政策导向、地方文化传统、媒介传播机制、民众参与方式等相互依赖的要素交织中)，“村BA”如何被村民、球员、观众、媒体、政府、学者等不同行动者持续地感知、诠释和赋予意义;个体、多元的初始理解,如何在互动中协商、竞争,并进一步形成某种主导性的集体认知;以及这种集体认知本身又如何随着型构的变化而演变。由此,埃利亚斯实现从康德的先验哲学到基于历史与认知双重维度的“型构”认识论的根本转向^[13]。这不仅为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坚实的方法论根基,也为理解新时代中国不断涌现出的体育社会现象提供关键理论透镜。

2.2 对静态分析的批判: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到埃利亚斯的“社会过程”

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建构重点是对帕森斯

结构功能主义的公开批判。二战后的十五年间,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一直处于主宰或领军地位^[14],其将社会视为一个由各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构成、追求均衡的“社会系统”。而埃利亚斯却对此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种范式掺杂从古典物理学时代遗留下来的哲学残余,是“哲学性”或“形上性”,其内含的短期、静态、系统等概念工具却往往会让人囿于一个无时间的、功能先定的世界,而其“目的论视角”还带有“强烈的目的论基调”,即假设所有制度的存在都是为了维持“系统”的功能运转良好^{[12]93-95},这掩盖了社会变迁的真实过程。

应用帕森斯范式分析“苏超”现象,可能会将其拆解为政府、市场、社会等静态结构要素,并探讨它们如何协同维持赛事系统的功能,如促进认同、拉动经济、城市文化等。然而,这种静态分析难以充分解释“苏超”为何以及如何从普通的城市足球联赛,演变为席卷社交媒体、凝聚强烈地方情感的文化事件。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则注重审视其动态的生成过程,如江苏“十三太保”如何因其长期存在的“散装”文化特质,在社交媒体互动、城市间荣誉竞争、民众的参与热情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关于地方认同、动态演变的关系网络。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型构过程,而非某种预设、功能先定的静态结构,塑造了“苏超”这一现象级文化事件的独特面貌与社会意义。

由此,埃利亚斯倡导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完成根本性的转向,将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意识,从追问“社会是什么”的实体性、结构性问题,转向探究“社会如何发生与变迁”的过程性、生成性问题。这一转向落实到具体分析中,意味着方法论重心的变化。帕森斯范式倾向于分析抽象化、受规范与价值导向的“人的行动”,这种行动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剥离行动者具体的身心状态与历史社会脉络。埃利亚斯主张,社会学研究考察的是社会问题的长时段过程,必须处于具体历史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开展行动的人”,即考察相互依赖、具有特定心理倾向(心理发生)的行动者,其行为如何在长期的型构过程中被塑造、调整并反过来影响型构本身。对人的运动行为型构的考察,正是这一方法论的具体体现。

2.3 对心理机制的改造:从弗洛伊德的个体“超我”到埃利亚斯的“心理发生”

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建构最为深刻的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吸收。学界普遍认为,弗洛伊德是埃利亚斯最重要的灵感来源^[15]。埃利亚斯本人亦曾坦言,只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他的理论工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埃利亚斯对弗洛伊德的认同,有其显性文字记载与隐性的思想共鸣,其对于羞耻、难堪等情感以及行为内在约束机制的关注,特别是“超我”和内在无意识的解释就很弗洛伊德。然而,埃利亚斯并非简单套用精神分析概念,而是对其进行关键性的社会学与历史学转化。弗洛伊德将“超我”视为个体心理中相对静态的结构,是外在社会规范内化的结果,其实是“自我与本能间的冲突”^[6]。埃利亚斯从根本上将个体化、去历史化的心理机制加以动态化与过程化。负罪感、羞耻感、难堪感等心理发生,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机制,而埃利亚斯在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吸收后,则将这种无意识看作是自我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意识相互配合维持着自我控制机制。在埃利亚斯看来,自我控制机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机制,还是一种社会历史机制,它会促使那些最初由外部社会施加的强制(社会发生),通过代际传递和日常实践,逐渐被行动者习以为常、内化于心,并最终成为大多数人的“第二天性”(心理发生)。

这一心理机制的改造在现代足球规则、情感管理与行为规范的演变中就有所体现。足球运动早期,场上的越轨行为或暴力冲突往往出于本能的愤怒或求胜欲,近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驱动。随着足球“文明的进程”,不断完善的规则(如红黄牌的诞生等)促进足球的进步,它使得裁判可以积极引导比赛走向,形成了良好足球比赛秩序。这构成社会对暴力施加的外部强制。然而,足球“文明化”或“体育化”的真正标识在于这种强制如何被内化,即优秀足球运动员逐渐培养出一种超越规则畏惧的“体育素养”或“sportsmanship”精神。他们在可能恶意犯规的瞬间选择收脚,在即将互殴的瞬间选择冷静,不仅是基于对处罚的算计,还是源于对足球运动公平竞争(赛事文明)的内化认同,以及随之产生、发自内心的羞耻感。这一转变绝非个体心理的成熟,而是足球运动员在长期的训练、比赛互动(即足球“型构”)中,通过代际传递、媒介传播、同行压力等社会机制,共同塑造并传承的一套情感管理与行为控制模式。这正是埃利亚斯所说的“心理发生”,即个体心理结构(从冲动到自律)与社会结构(从暴力游戏到文明体育)在历史进程中的共同生成。

由此,埃利亚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在于将一种个体性、相对静态的心理结构(超我),改造为一种历史性、社会性的“心理发生”过程。进一步讲,社会秩序结构与个体人格结构,是在“文明的进程”中相互依存、共同塑造的社会发生与心理发生的

统一体。

2.4 对历史视野的拓展:从韦伯的“理性化”到埃利亚斯的“体育化”进程

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建构离不开与韦伯“理性化”的对话,在与其对话中表达出他对韦伯历史视野的过程性拓展。尽管他继承了韦伯对历史进程和“理性化”的深切关怀,却在研究出发点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埃利亚斯指出,韦伯通过“理想类型”所构建的理性化叙事,本质上是静态的类型学比较,它将流动的历史“结果”概念化,却难以解释这些结果是如何在时间中“生成”的。在埃利亚斯看来,理性化并非某种先验的逻辑结构,而是人类在具体的、相互依赖的社会型构中逐渐探索的共同的行为习惯与心理机制。

为真正捕捉这种动态生成过程,埃利亚斯创造“体育化”——一个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交织出来的理性化的过程,只是这个理性化不仅是体育服务于个体的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还有一种以羞耻感或恐惧感的非理性形式体现出来的价值理性^[7]。这从现代体育运动的起源与演变中,可清晰辨识两种分析路径的差异。韦伯式的分析往往把“现代体育制度”作为理性化“理想类型”的结构特征;而埃利亚斯则将其视为跨越数世纪的“体育化”进程。从18世纪英国消遣活动发生两次体育化转型,到随后伴随“文明的进程”逐步演化为欧式、美式乃至全球式的体育传播阶段^[8],现代体育实现了规则的书面化、竞赛的非暴力化与组织的科层化^[9]。埃利亚斯将分析焦点从韦伯式的“历史中的理性”(理性作为在历史中显现的常量),转向“理性的历史发生”(理性作为在历史中被型构的变量)。

这一“体育化”进程反映了埃利亚斯所说的社会发生与心理发生的交织。一方面,现代体育的外部组织形式日趋理性化、规范化(社会发生)。另一方面,参与者(包括运动员和观众)的情感表达与行为方式也经历文明化重塑,从直接暴力冲突与情绪宣泄,转向规则框架内的竞争与克制(心理发生),表现为情感控制下的有序释放。体育中的理性,如公平竞赛、遵守规则等,并非如韦伯设想的根据一种先验的逻辑而预先设计好再推广的,而是在运动员、教练员、组织者、管理者、观众等多元行动者的长期互动与相互依赖中,被一步步探索、协商、固定下来的集体共识与行为方式。这就是埃利亚斯通过“体育化”进程对历史视野的根本性拓展,他将韦伯的“理性化”转化为可经由经验研究追溯的(深入体育史具体考察的)、关于社会发生与心理发生二者相互交织生成的动态的体育历史社会学。

3 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回响:理论延展与本土关照

3.1 确立“投入-超脱”的研究姿态,追求有温度客观

为进一步分析知识的社会生成,破除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避免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分离,埃利亚斯提出“投入”和“超脱”两个概念,并特别声明不存在绝对的“投入”与“超脱”,它们二者是相互融合的,只不过是权重比重有所不同。权重比重的变化,调节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超脱越多越偏向客观取向,现实适当性越重(即越以贴近现实为上),与自主性相对而言的“异治性”也就越重,越倾向于站在“他们”或“他”的角度言谈思考,即“它-功能”;反之,投入越多越偏向主观的取向,思考时幻象的成分、魔幻-神话性的思考就越多,自主性也越强,越倾向于以“我们”的角度言谈思考,即“我们-功能”^[20]。在埃利亚斯看来,建构自主的体育知识体系是一个长期、代际相传的过程,并非简单的上层建筑反映。作为关系性与过程性的统一体,它始终处在“投入-超脱”的张力之中,否定了终极真理(完全投入)、完全超然(完全超脱)以及绝对的主客观之分,旨在考察如何从不太充分的客观体育知识中逐渐发展出更充分的客观知识。

将“投入-超脱”作为方法论姿态引入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其价值不仅在于埃利亚斯理论本身的启示,更在于它呼应并深化社会科学质性研究中一项长期存在的方法论自觉,即在研究者“局内人”的情感共鸣与“局外人”的理性观察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这一平衡本身是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素养,并非埃利亚斯理论所首创或独创。然而,埃利亚斯的重要贡献在于,一生致力于“人的科学”,将这一实践层面的职业素养,提升为一种具有历史与过程导向的理论工具,特别适用于分析体育这类高度情感化的社会现象。例如,在研究“归化球员的国家认同”或“中超联赛的球迷文化”等议题时,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既不能像普通球迷一样完全“投入”于特定的立场,让情绪遮蔽分析;也不能像冰冷的机器一样绝对“超脱”,以至于无法理解忠诚、归属感等情感对行动者的真实意义。进一步讲,体育知识的生产是在“我们-功能”的情感关联与“它-功能”的冷静分析之间徘徊。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应当在“局内人”的理解与“局外人”的审视之间保持一种有意识的、动态的平衡,自觉培养一种“双重视角”:既能深入田野,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切身感受研究对象的生命经验(投入);又能适时抽身,将个案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型构与历史脉络中,进行冷静的比较

与分析(超脱)。

中国体育社会学追求的是更大程度的超脱,以产生关于所调查问题的现实一致的知识。它并非情感的消除,而是通过有意识的距离保持,实现一种“迂回式的投入”,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体育实践中的情感、权力与知识交织的过程。“投入-超脱”所倡导的是在情感共鸣与理性观察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更自觉、更具历史感地追求一种“有温度的客观”。这一研究姿态既体现跨学科方法论的共识,也可借鉴埃利亚斯的理论视角,获得更丰富的历史纵深与过程性解释力。

3.2 坚持“过程-关系”的分析范式,超越静态结构表象

认识论是独立于个别科学学科的直接问题,其任务之根本在于对科学知识加以澄清和说明^[21]。埃利亚斯体育知识原则上并不依赖于认识论,同样,认识论也不能产生决定什么算是体育知识、什么不算体育知识的律令。从认识论的角度探究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贡献,首要任务是回归基于“型构”的体育型构社会学认识论,建构体育型构社会学研究的双重逻辑,即历史与认知的一体之两面。它提供了一种能够超越静态结构表象的“过程-关系”分析范式,要求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从根本上转变视角,不再将体育社会现象视为由固定要素构成的“结构”或“系统”,而是将其理解为由多元行动者在相互依赖与权力平衡中共同塑造的、持续流动的“关系网络与生成过程”。

从《文明的进程》到《追寻兴奋》,埃利亚斯对“文明的进程”中体育的发生学、体育化的内生动力机制、体育文明的理想化憧憬,以及不同人类生存单元^[22]在社会型构变迁中与“他者”共存的处境,作了详细的历史考察。埃利亚斯式的历史分析,对能产生体育社会学认知革新的路径更为在意。埃利亚斯式的历史分析不太关心精确历史细节,也不会精确复原体育历史的每一处细节,注重的是赋予体育社会学“历史维度”或“历史意识”,即通过“历史发生学”分析,揭示体育形态、规则与情感模式背后的社会生成与心理生成逻辑,并提防体育社会学研究“退回到当下”。“文明的进程”中体育的经验研究,及蕴含认识论意涵的体育、体育化和体育文明研究,在本质上是由结构性分析(对体育社会型构特定趋向的判断)与认知性分析(对不同人类生存单元在体育方面上自我形象、自我认知演化的分析)构成的体育型构社会学的双重维度,并由历史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互相支撑。这种分析超越宏观“结构”与微观“认知”的二元割裂,展现历史与认知作为同一型构过程的一体两面。

作为体育社会实践的工具,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为体育社会型构中的情感取向、价值判断与行动

策略提供一定方向上的指引。它超越传统体育知识“通过内部分析”提出问题的范式，而转化为考察体育知识“外部型构发生”的知识社会学研究，即对认知主体在中国体育社会型构中经验性存在状态的考察，认知实践也成为主体的体育社会实践本身，而不是体育社会因素的简单派生物。通过型构，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为中国体育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一条可以涵盖“宏观-中观-微观”研究对象的分析工具。它开拓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宽泛性与全面性，如国家体育总局形成的型构分析(宏观研究对象)、某一运动项目文明化的型构分析(中观研究对象)以及人的体育化的型构分析(微观研究对象)等；在研究方法上，摒弃对举国体制、体教融合、公共体育服务、体重管理、健康老龄化等概念的静态要素分析，转向追踪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家庭及个体等多元行动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与权力动力学；在分析视角上，将任何体育政策或现象都视为一个正在发生的型构过程，重点考察其如何被建构、协商、演变，以及在此过程中行动者的相互依赖关系如何被重新配置；在理论目标上，通过对这些具体型构过程的深入考察，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发展的独特逻辑与内在动力，旨在打破基于静态比较的二元叙事(如“国家 vs 社会”)，建构一种基于中国经验、反映互动过程的动态理论叙事。

3.3 拓展“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激活深层次想象力

从“文明的进程”中体育到体育“追寻兴奋”，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演化因其研究聚焦人类体育社会发展的长期过程而具有鲜明的历史社会学色彩。当前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呈现出一个值得反思的倾向，研究者虽然会在学术研究中的第一部分设置“历史沿革”或“发展脉络”，但这大都是将历史作为背景铺垫或材料罗列，并未真正将“历史意识”内化为核心分析方法与理论视角。本质上，这些研究多是从当下问题出发，“回溯”或“裁剪”历史以服务现状分析，却未将体育现象真正置于长时段的“文明的进程”与社会型构变迁中加以理解，从而陷入了埃利亚斯所批判的“现在中心主义”困境。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体育社会学呈现出学术功利化趋势，这无疑是让体育社会学者可能选择更多实用性强的“快餐式”研究^[21]，而缺乏对体育“文明的进程”的深层把握与持续关注。特别是总有一批“后备体育社会学者”不惜撇开自己深耕已久的领域而转向研究“流行”政策及其实现路径，不免带有“蹭热度”的急功近利之嫌。

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带有强烈“历史取向”，将历史视野带回体育社会学研究以重新激活体育社会

学的想象力，特别有助于扭转异化已久的困局。丹尼斯·史密斯^[24]在《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中将他列为战后历史社会学第二阶段发展的思想渊源。二战后，社会学研究中心已由欧洲转向美国，历史社会学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略显边缘化，但它却触发了美国社会学界对帕森斯构筑的“静态结构分析”的反思。埃利亚斯^[25]在《文明的进程》中明确批判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是一种割裂了历史的“纸牌游戏”，并以“文明发生学”的分析构成实质性回应。其中，他把体育作为方法，审视人类文明的进程。例如，他提出体育化(有规则、有标准、正式的现代体育形成过程)并将其与英国议会制度的巩固(有规则的、较和平的政治权力演化过程)联系在一起。这两个过程都必须以参与者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的某一转变为基础，如理性化、心理化等^[26]。埃利亚斯格外强调要把类似“文明发生学”的问题意识重新带回体育社会学，即探究体育社会究竟有着怎样的结构性特征，有着怎样的机制性逻辑，以及当今社会文明的体育行为或体育的文明行为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围绕体育文明发生学的历史社会学问题意识，为中国体育历史社会学研究带来想象力。

中国体育社会学应当自觉承接这一以发生学为内核的历史社会学传统，首先是培养一种将当下“问题化”的能力，即通过追溯体育实践的社会发生与心理发生过程，去回答“当下的体育行为、制度与情感模式何以成为可能”这一追问。其次，中国体育社会学要注重共时性与历时性双重逻辑，即超越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诸多体育社会结构性要素的静态描述，即共时性分析；而是从更长历史阶段中爬梳某体育社会现象或问题的史料，把原本孤立而僵化存在的诸多体育社会结构性要素整合为相互作用的整体，具体而历史地勾勒出“体育社会现象”或“体育社会问题”的社会发生过程，并产生体育发生学的具体脉络，即历时性分析。最后，这一方法论自觉要求中国体育社会学实现从“历史素材的工具性调用”到“历史理性的建构性融入”的认知范式转型。突破对历史的工具性运用，如史料的全面与考据的精详等，激活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深层次想象力，特别是在阐释中国体育社会问题或现象时，构建起既具备历史纵深感又具有理论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从而为建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体育社会学知识体系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

4 结语

中国体育社会学面临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与特色体育社会学的重要使命，这一进程并非意味着封闭与

排外,而是需要在扎根中国体育实践的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批判性汲取国际体育社会学资源。当然,汲取的目的不在于成为另一理论传统的注脚,而在于通过创造性转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使其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构成。埃利亚斯的体育社会学思想在当代中国激起的回响,其意义在于唤起一种方法论上的主体性自觉。它启示中国体育社会学应超越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或对中国现象的表层描述,尽管这是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的重要一部分,但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已不再适应,而应以“投入与超脱”的反思性姿态、“过程-关系”的分析范式与“历史社会学”的想象力,直接切入中国体育社会变迁的“现场”,成为本土知识的“生产者”,而不再是知识的“消费者”。这不仅是理解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思想的最佳方式,也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体育社会学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 [1]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7.
- [2] 新华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 (2025-10-28)[2025-12-29].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10/content_7046050.htm
- [3] 洪晓楠.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EB/OL]. (2022-06-28)[2025-10-07].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2/0628/c40531-32459086.html>
- [4] 杨桦,任海.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构建[J]. 体育科学,2022,42(8):3-20.
- [5] DUNNING E. Figuratio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sport[J]. Theory, Sport and Society, 2002: 211-238.
- [6] TABBONI S. Norbert Elias: Un ritratto intellettuale[M]. Bologna: Il Mulino, 1993: 11.
- [7] MEMOIR A. Norbert Elias (1897-1990)[J].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990, 5(4): 371-372.
- [8] LAQUEUR W. A history of Zionism[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6: 485.
- [9] 格尔特鲁德·普菲斯特,刘岳冶. 国际体育史研究的现状、问题的前景[J]. 体育科学,1997,17(1):87-90.
- [10] DUNNING E. A remembrance of Norbert Elias[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992, 9(1): 95-99.
- [11] 诺伯特·埃利亚斯. 符号理论[M]. 熊浩,高乐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2.
- [12] 丹尼斯·史密斯. 埃利亚斯与现代社会理论[M]. 李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13] 王树生. 建构“构型”认识论:埃利亚斯对先验认识论的社会学转化[J]. 社会理论学报,2019,22(1):205-238.
- [14] MENNELL S. Norbert Elias: Civilization and the human self-image[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24.
- [15] 阿尔帕德·绍科尔采. 反思性历史社会学[M]. 凌鹏,纪莺莺,哈光甜,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
- [16] 宋崇. 浅析埃利亚斯的思想来源——与韦伯、弗洛伊德的对话[J].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3(3):83-89+112.
- [17] 王松,阿柔娜,王长在,等. 体育化阐释与文明的进程关系研究[J]. 体育学刊,2022,29(2):20-25.
- [18] 王松,阿柔娜,郭振. 文明进程中体育化浪潮的发生、现代性及当代思考[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3,42(2):130-137.
- [19] 钟准. 体育运动中的政治[J]. 读书,2016(7):34-42.
- [20] 王松. 文明·型构·体育化:体育型构社会学研究[D]. 北京:清华大学,2023.
- [21] 石里克. 普通认识论[M]. 李步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6-17.
- [22] KASPERSEN L B, GABRIEL N. The importance of survival units for Norbert Elias's figurational perspective[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008, 56(3): 370-387.
- [23] 熊欢. 机遇与挑战:对国际体育社会学50周年大会的审视[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42(4):15-20+39.
- [24] 丹尼斯·史密斯. 历史社会学的兴起[M]. 周辉荣,井建斌,赵怀英,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25] 诺伯特·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M]. 王佩莉,袁志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6.
- [26] 李康. 诺伯特·埃利亚斯[M]//杨善华,谢立中. 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1.